

大屠杀记忆与美国外交

HOLOCAUST MEMORY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 集体记忆的认同效应及其战略性运用 ■
- 双重认同下的大屠杀记忆 ■
- 大屠杀经历与“极权主义”理论的形塑 ■
- 大屠杀记忆与美以特殊关系 ■
- 大屠杀记忆、犹太人与美国人权外交 ■
- 大屠杀记忆与新干涉主义文化在美国的兴起 ■

汪舒明◎著

时事出版社

013064271

D871.20
108

大屠杀记忆与美国外交

HOLOCAUST MEMORY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汪舒明◎著



北航

01671519

时事出版社

D871.20
108

173084271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屠杀记忆与美国外交/汪舒明著. —北京: 时事出版社, 2013. 8
ISBN 978-7-80232-629-3

I. ①大… II. ①汪… III. ①美国对外政策—研究 IV. ①D87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62891 号

出版发行: 时事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巨山村 375 号
邮 编: 100093
发行热线: (010) 82546061 82546062
读者服务部: (010) 61157595
传 真: (010) 82546050
电子邮箱: shishichubanshe@sina.com
网 址: www.shishishe.com
印 刷: 北京百善印刷厂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21.75 字数: 282 千字

2013 年 8 月第 1 版 201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5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序

作为来自国内犹太研究重镇之一的上海犹太研究中心以及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的青年研究人员，汪舒明在2007年9月进入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攻读博士学位之前，就已在犹太学领域崭露头角。他于2011年6月从复旦大学毕业并获法学博士学位，而《大屠杀记忆与美国外交》一书便是在其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经过为时2年多的细心修改和认真打磨而付梓问世的。

汪舒明博士的研究方向是宗教与当代国际关系，但他在博士论文中所采用的主要还是犹太学和历史学的路径，资料丰富，叙事生动，旁征博引，考证细腻，详尽地讲述了“大屠杀”从如何成为美国犹太人的生活焦点和集体记忆，到成为美国集体记忆和主流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再到成为西方乃至国际社会的历史记忆的一部分，以及此种历史记忆在过去和现在对美国犹太人的身份认同、美国内政外交以及当代国际政治所产生的重要影响，尽管作者在本书的开头遵循国际政治/关系博士学位论文的惯例，精心搭建了“集体记忆与集体身份认同”的理论框架。作为汪舒明博士论文的指导老师，本人的教育背景与汪博士颇为相似，对他处理宗教学、历史学和国际关系学相关问题的能力，一直非常欣赏。

诚如《经济学家》杂志的两位编辑所言，美国的外交政策是“比其他任何国家都更是充满各种传统和矛盾的一团乱麻”，而历史学家米德（Walter Russell Mead）就曾勾画出美国外交政策的四大传

统，即杰斐逊主义、杰克逊主义、汉密尔顿主义和威尔逊主义。在整个美国史上，某个传统用过头通常会产生向另一个方向的摆动，而所谓集体记忆也是五花八门，并常常是忽冷忽热、相背而行的，如“另一个慕尼黑”与“另一个越南”两种集体记忆和比附之间就存在着巨大差异和张力。事实上，美国从殖民地时代以来的历史经历尤其是外交史经历足以使此后的大多数外交事件获得了比附对照的模板，而历史学者的任务之一就是要透过种种经验之历史、被建构之历史以及受操控之历史的迷雾，揭示出此种比附的误用、误导、滥用、简化和歪曲，甚至还要披露出某种集体记忆的被淡化和遗忘的背后原因，如美国外交史学界新左派对所谓“冷战凯旋派”的冷战叙事通常不提韩战和越战的批判，并因此而参与了对历史的重新建构和诠释。汪博士是深知此种比附的政治功用的，在本书中他就这样写道：“集体记忆对身份认同的影响使得集体记忆在政治上产生了战略利用的价值，经常被政治活动家以类比或借喻等方式唤起，用于意义架构和社会动员，并为某种政策进行辩护和宣传。”“以古喻今”和“以史为鉴”使历史和记忆被有选择地激活而进入当今社会政治实践是普世现象，而集体记忆塑造群体情感和认同从而影响一国外交政策和国际政治亦不乏先例，因此汪博士对大屠杀记忆的个案研究和理论探索具有较普遍的现实意义。

大屠杀记忆对当代美国政治和外交有着重要影响，但该领域却是国内美国外交史学以及犹太学研究的薄弱环节。《大屠杀记忆与美国外交》一书将以其专业性、思辨性和启迪性而成为该研究领域的一部重要研究成果。

复旦大学宗教与中国国家安全研究中心

主任 徐以骅

复旦大学宗教与国际关系研究中心

2013年7月

绪论	(1)
第一章 集体记忆的认同效应及其战略性运用	(17)
第一节 集体记忆的定义和特征	(18)
第二节 集体记忆与集体身份认同	(28)
第三节 集体记忆的战略运用及其误用	(38)
第二章 双重认同下的大屠杀记忆	(45)
第一节 纳粹噩梦中的“美国梦”	(46)
第二节 犹太民族主义架构下的大屠杀记忆	(57)
第三节 关于美国和基督教在大屠杀中的历史地位和责任的辩论	(76)
结语	(89)
第三章 大屠杀经历与“极权主义”理论的形塑	(91)
第一节 冷战前“极权主义”理论在美国的形成和发展	(92)
第二节 大屠杀记忆、冷战与“一致极权”论的兴起	(104)
结语 对“一致极权”论的批评和反思	(124)
第四章 大屠杀记忆与美以特殊关系	(129)

第一节 同情、忏悔和修补:美国主流社会对犹太人和以色列的态度	(131)
第二节 大屠杀和美国犹太人的政治转变	(149)
第三节 大屠杀记忆在捍卫以色列中的战略性运用	(169)
第四节 大屠杀阴影下的伊朗核危机	(184)
结语	(197)
 第五章 大屠杀记忆、犹太人与美国人权外交	(201)
第一节 犹太人参与冷战期间的美国人权外交	(202)
第二节 后冷战时期犹太人对美国人权外交的新参与	(209)
第三节 犹太人参与人权外交的动力	(233)
结语	(248)
 第六章 大屠杀记忆与新干涉主义文化在美国的兴起	(250)
第一节 美国与反“种族灭绝”国际机制	(251)
第二节 人道主义危机辩论中的历史比附	(263)
第三节 反种族灭绝倡议网络的初步形成 ——“拯救达尔富尔运动”	(281)
结语	(299)
 结语	(303)
 附录一 美国大屠杀记忆发展进程中的重要事项	(317)
附录二 主要组织译名表	(321)
附录三 主要参考文献	(323)
 后记	(341)

绪论

一、问题的提出

20 世纪后期以来,关于纳粹大屠杀 (Holocaust)^① 的研究和记忆在西方社会形成了热潮。以大屠杀为主题的回忆录、研究性著述以及其他文献可谓汗牛充栋。各种各样的学科都在从各自不同的视角,对这一惨绝人寰的历史悲剧及其后遗症进行解读和重新解读,并不断地从中汲取新的启示:法学家在对之反思的基础上创制着关于战争、人权、主权等方面的国际法制框架;社会学家以之为鉴思索着现代性症候及其救治;神学家不得不对上帝的属性及其与人的关系进行重新解读……。西方国家都相继设立专门的大屠杀纪念日和机构,对于这一悲剧开展记忆。根据大屠杀教研组织联合会 2009 年的成员组织名录,全球共有 270 多家机构专门从事大屠杀研究、教育和记忆,这些机构遍布全球各大洲 28 个国家。^② 以大屠杀为主题的文学、影视、戏剧、音乐、美术等各种形式的文艺作品,也形成了国际范围内文化产业的至关重要的部分。就大屠杀电影而言,

① 纳粹大屠杀主要指二战期间纳粹德国对欧洲犹太人以及其他群体的集体迫害和灭绝,英文中专用名词为“Holocaust”,另一个为来自希伯来语的专用名词“Shoah”。为行文便利,下文中若无特指,就以“大屠杀”指称“纳粹大屠杀”。

② William L. Shulman (edit.), *Association of Holocaust Organizations, 2009 Directory* (Houston: Holocaust Museum Houston, 2009)。

从20世纪40年代至今,全球共制作了164部故事片和157部记录片。其中《安妮日记》《苏菲的选择》《钢琴家》《辛德勒的名单》《朗读者》等多部影片都获得了国际大奖。^①此外,全球各地还相继举办了难计其数的展览。2000年1月27日,全球44国政府代表在瑞典的斯德哥尔摩召开会议,专门探讨大屠杀的纪念、教育和研究,并一致通过了设立国际大屠杀纪念日的目标宣言,并将每年的1月27日设定为国际大屠杀纪念日。^②可见,记忆大屠杀已经成为一种全球化的社会文化现象。

在美国,关于纳粹大屠杀的研究和记忆也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从战后到60年代,无论在美国还是美国犹太人中,大屠杀都很少出现在公开讨论中,相比较而言,广岛更受关注。犹太人即使提及这一悲剧,也尽量弱化其中犹太人受难的特殊性,而强调其普世主义的教训。在50年代发行量极大的《安妮日记》中,对安妮事迹的主流解读就呈现出乐观主义和普世主义的基调。较早出版的一些关于大屠杀的作品,也大都以华沙隔都大起义之类的事迹为主题,以展现犹太人英雄主义的一面。到60年代初,一些有关大屠杀研究的专著,如劳尔·希尔伯格的《欧洲犹太人的毁灭》等,纷纷出版。纳粹党卫队头目艾希曼被捕及其在以色列公开受审受到了西方媒体的极大关注。随着审判的进行,大屠杀以其本来面目展现在公众面前,从以色列舶来的“Holocaust”一词迅速进入美国的公众视线,并与纳粹屠杀欧洲犹太人紧密关联。汉娜·阿伦特以记者身份对艾希曼审判所作的系列报道和评论发表在《纽约客》上,同年这些文章以《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关于“平庸的恶”的报告》为题在美国结集出版。她所提出的“平庸的恶”很快引发了一场关于大

① “List of Holocaust films”, http://en.wikipedia.org/wiki/List_of_Holocaust_films. 上网时间2010年6月13日18点。

② 1945年1月27日,苏联红军解放了奥斯威辛集中营,国际大屠杀纪念日即以这一日期确定为每年的1月27日。

屠杀原因和性质的大辩论。这一时期,另一件引起轰动效应的事件是美国犹太组织与天主教一起阻击鲁道夫·霍克胡特的剧本《代理人》(*The Deputy*) 在百老汇上演,该剧抨击教皇出于种种原因,面对纳粹大屠杀无动于衷。这些事件的发生,逐渐打破了15年来关于大屠杀的近乎沉默,大屠杀作为一个独特事物凸显在美国文化中。

“六日战争”(1967年)和“赎罪日战争”(1973年)进一步唤醒了美国犹太人的大屠杀记忆,他们开始将推进大屠杀记忆和教育置于其议程的关键地位。受害者文化和多元文化主义在美国盛行,进一步推动犹太社团的共同关切大屠杀教育和研究。1978年,题为《纳粹大屠杀》(*Holocaust*)的四集电视纪录片在美国公映,大约有1.2亿人至少看了其中的一集,这相当于一半左右的美国公众。该片的公映在美国引起了轰动,成功地将纳粹暴行注入美国公众的意识之中。同年,美国总统卡特推动建立了“总统大屠杀纪念委员会”,并决定在华盛顿筹建“美国大屠杀纪念馆”(USHMM)。在犹太组织的游说下,各州纷纷通过立法支持大屠杀教育。^①

到后冷战时期,“大屠杀”不仅成为美国犹太生活关注的焦点,也成为普遍的美国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②“美国大屠杀纪念馆”于1993年在华盛顿国家广场的显要位置建成,同年,斯皮尔伯格导演的《辛德勒的名单》上映。这些都充分显示出大屠杀在美国社会文化中的重要影响,也显示出大屠杀记忆已经“美国化”了。大屠杀纪念馆的广泛建立、大屠杀纪念日的确立、各州有关大屠杀教育的立法以及颇具规模的大屠杀教研群体的存在使美国的大屠杀记忆和教育变得高度“机制化”。根据大屠杀教研组织联合会(AHO)

① 到2004年,至少有20个州有关于大屠杀教育的立法,有26个州设立了大屠杀学术的标准。参见Yair Auron, *The Pain of Knowledge: Holocaust and Genocide Issues in Education* (London: Transaction Publishers, 2005), pp. 111-112.

② [美] 乔纳森·D. 萨纳著,胡浩译:《美国犹太教史》,大象出版社,2009年版,第285页。

2009 年度指南, 共有近 200 个大屠杀教研组织遍布北美各地, 其中以“美国大屠杀纪念馆”和“西蒙·维森塔尔中心”实力最为强大, 前者有 400 名专职员工和 400 名志愿者, 而后的专职员工和志愿者分别达到了 180 名和 150 名。^① 自 1993 年开馆到 2004 年初, 约有 2000 万人参观了“美国大屠杀纪念馆”, 其中有 80% 的参观者并非犹太人。^② 以大屠杀教育为己任的国际非政府组织——“直面历史 (Facing History and Ourselves)”在 20 余年间也吸引了 100 万学生和 11000 名教师参与其课程。^③ 大屠杀进入公众视线, 成为美国社会文化中无处不在的现象。1995 年, 美国纪念二战结束 50 周年的中心主题为“面对大屠杀”。^④ 1996 年, 《纽约时报》发表了 500 多篇有关大屠杀的文章, 而《华盛顿邮报》则发表了 300 多篇。^⑤ 围绕这一历史事件, 在美国已经形成了一个规模庞大的文化“产业”。尽管美国并未直接卷入大屠杀, 大屠杀在美国的民族历史中也只占据了一个次要角色, 但大屠杀似乎在美国集体记忆中扮演了中心角色: 巨大的力量投入大屠杀纪念, 包括在华盛顿国家广场建立美国大屠杀纪念馆; 成为美国文化产业的中心关切; 在政治论辩和话语中基本不受挑战的存在。^⑥

社会群体所建构和展现的记忆, 本质上是一种话语政治实践。这种实践往往受制于该社会某种形态的社会政治结构并反过来影响

① Association of Holocaust Organization, 2009 Directory.

② Yair Auron, *The Pain of Knowledge: Holocaust and Genocide Issues in Education*, p. 110.

③ Ibid., p. 115.

④ Peter Novick, *The Holocaust in American Life* (Boston and New York: A Mariner Book, 1999), p. 63.

⑤ Helene Flanzbaum (edit.), *The Americanization of the Holocaust*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9.

⑥ Ross Poole, “Misremembering the Holocaust: Universal Symbol, Nationalist Icon or Moral Kitsch?”, in Yifat Gutman, Adam D. Brown and Amy Sodaro (edited), *Memory and the Future: Transnational Politics, Ethics and Society*, Palgrave Macmillan, 2010, p. 40.

社会政治结构。作为一场由美国犹太社团为核心推动力量,遍及美国社会全体的大众文化运动,大屠杀记忆在美国的建构、展现也总是与美国社会政治舞台的一系列“困惑”紧密关联起来:(1)犹太人在美国发挥着远远超过其人口比例的社会政治影响力,但在美国主流社会却没有出现强烈的反犹主义。大屠杀记忆与二战后犹太人在美国的社会政治地位和权力的改变存在怎样的互构关系?(2)以色列三番五次地挑战美国在中东的战略利益,但保障以色列的生存和安全却始终是美国社会的共识。大屠杀记忆如何使美国的对以色列政策带上了浓厚的道义色彩?(3)在双重认同的处境下,美国犹太人如何通过大屠杀记忆来重塑和表达其身份认同?而纪念大屠杀这一远离美国本土的历史悲剧,对于阐述和表现“美国信条”又存在怎样的价值和意义?(4)大屠杀记忆及其所体现的社会规范体系,又以怎样的方式对诸如人权运动等美国的社会政治运动产生影响?最后,与其他许多记忆实践一样,大屠杀记忆如何成为一种被误用和滥用的政治工具,成为“历史的重负”?

二、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一) 国外学界相关研究

大屠杀研究在西方是一门“热学”和“显学”,不仅受到历史学的关注,也受到其他众多学科的关注。关于美国与大屠杀之间关联的研究,主要可以分成以下两大类:

1. 研究美国政府以及美国国内不同的社会群体对大屠杀的反应,及其在大屠杀历史进程中的角色和地位。这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探讨美国政府、尤其罗斯福政府在大屠杀进程中的角色

和责任。^① 总体而言, 这些著述对美国政府在战时拯救欧洲犹太难民的角色和作用充满批判和质疑。具有代表性的如戴维·怀伊曼 (David S. Wyman), 他在《抛弃犹太人》一书中, 依据史实阐述了救助欧洲犹太人问题上罗斯福的冷淡和漫不经心, 美国国务院的阻梗等。

第二, 探讨美国犹太社团及其领导人在大屠杀进程中的角色。^② 大卫·沙皮罗 (David H. Shapiro) 在其《从慈善事业到行动主义》一书中, 作者描述了在大屠杀消息影响下, 美国犹太领导人对锡安主义 (zionism) 事业从慈善事业式的温和节制转向激进行动主义。怀伊曼则在他的前述著作中指出, 美国犹太社团的虚弱无力和内部分歧使得其作用大打折扣, 但正因为美国犹太社团的推动, 美国的表现仍然好于其它盟国。

第三, 探讨美国一些基督教、媒体、企业在大屠杀过程中的反

① 代表性著作有, David S. Wyman, *The Abandonment of The Jews: America and the Holocaust, 1941 - 1945* (New York, 1985); David S. Wyman, (ed it) . , *American and the Holocaust, Vol. 13: Responsibility for America's Failure* (New York, 1991); W. D. Rubinstein, *The Myth of Rescue: why the democracies could not have saved more Jews from the Nazis*, New York, 1997; Richard Breitman and Alan M. Kraut, *American Refugee Policy and European Jewry, 1933 - 1945* (Bloomington, Ind. , 1987); Martin Gilbert, *Auschwitz and the Allies* (New York, 1981); Henry L. Feingold, *Bearing Witness: How America and Its Jews Responded to Holocaust*,

② Rafael Medoff, *The Deafening Silence: American Jewish Leaders and the Holocaust* (New York, 1987); Haskel Lookstein, *Were We Our Brothers' Keepers? The Public Response of American Jews to the Holocaust, 1938 - 1944* (New York, 1985); David S. Wyman, *American and the Holocaust, Vol. 5: American Jewish Disunity* (New York, 1990); Aaron Berman, *Nazism, the Jews and American Zionism: 1933 - 1948*, (Detroit, 1990); David H. Shapiro, *From Philanthropy to Activism: the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n Zionism in the Holocaust Years, 1933 - 1945* (New York: Pergamon Press, 1994); Jerold S. Auerbach, *Are We One? Jewish Ident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Israel* (New Jersey: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2001) .

应和角色。^① 例如利普斯塔特 (Deborah Lipstadt) 在《难以置信》一书中对美国媒体对大屠杀相关信息的反应做了细致的考察。费希曼 (Hertzel Fishman) 则在《美国新教和犹太国》一书中考察了美国新教在欧洲犹太人发生劫难的情况下, 对锡安主义产生的内部分歧: 以莱因霍尔德·尼布尔为代表的基督教现实主义积极支持锡安主义, 而占据主流的“全国教会理事会”则持一种模糊的立场。又如在布莱克 (Edwin Black) 的《国际商用机器公司与大屠杀》一书中, 作者考察了国际商用机器公司 (IBM) 在大屠杀过程中与德国纳粹的合作, 为后者提供技术支持的灰暗历史。此外, 福特、通用汽车等多家美国著名的企业也受到了类似的指控。

第四, 大屠杀幸存者在美国重建生活以及大屠杀善后事项 (如难民安置、战后赔偿等) 中美国的作用。^② 战后初期的《美国犹太年鉴》(*American Jewish Year Book*) 中也有不少文章阐述了美国政府和美国犹太社团积极帮助纳粹难民在美国重建生活, 融入美国社会的经历。

2. 将美国社会背景下的大屠杀记忆的建构和表现及其社会政治后果作为研究对象, 则主要可以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第一, 对美国社会中的大屠杀研究和记忆的发展进程及其影响进行综合述评。代表性的著作为彼特·诺维克 (Peter Novick) 的

^① Deborah Lipstadt, *Beyond Belief: The American Press and the Coming of the Holocaust, 1933 - 1945* (New York, 1986); Hertzel Fishman, *American Protestantism and A Jewish State* (Detroit, 1973); Edwin Black, *IBM and the Holocaust: the strategic alliance between Nazi Germany and America's most powerful corporation* (New York: Three Rivers Press, 2002) .

^② 参见 Leonard Dinnerstein, *America and the Survivors of the Holocaust* (New York, 1982); Haim Genizi, *America's Fair Share: the Admission and the Resettlement of Displaced Persons, 1945 - 1952* (Detroit, 1993); William B. Helmreich, *Against All Odds: Holocaust Survivors and the Successful Lives They Made in America* (New York, 1992) .

《美国生活中的大屠杀》。^① 诺维克强调将大屠杀记忆推向美国大众乃是出于犹太社团决策选择的结果，还揭示了大屠杀记忆被美国犹太人以及美国政客工具化运用的方式和特征。他还分析了大屠杀记忆对于美国犹太认同以及更广泛的美国认同的影响。

第二，对大屠杀记忆对美国犹太人的认同、尤其对锡安主义运动的影响进行述译。作为美国犹太身份认同建构中的核心要素之一，任何以战后美国犹太史为主题的著作都难以回避大屠杀记忆的影响。梅尔温 I. 尤洛夫斯基 (Melvin I. Urofsky) 在《我们命运与共》^② 一书中，评述了大屠杀记忆对美国锡安主义运动的影响。布伦鲍姆 (Michael Berenbaum) 在《悲剧与胜利之后》^③ 一书中也对大屠杀记忆对犹太人的身份认同和政治理念的影响进行了评述。

第三，对大屠杀记忆在美国社会政治舞台中的运用进行述评。一种是相对中立的描述性研究，叙述大屠杀话语如何在一些国际人权运动或美国国内的民权运动中运用，^④ 这种运用在反对“种族灭绝”运动中尤其有着特殊作用。另一种对大屠杀记忆在美国、以色列等社会中的滥用和误用进行批判性研究。前述诺维克的著作就对大屠杀记忆在美国的误用和滥用进行了语调温和的批判。更激进的

① Peter Novick, *The Holocaust in American Life* (Boston and New York: A Mariner Book, 1999) .

② Melvin I. Urofsky, *We Are One: American Jewry and Israel* (New York: Anchor Press, 1978) .

③ Michael Berenbaum, *After Tragedy and Triumph: Essays in Modern Jewish Thought and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

④ 在这方面，相关著作主要有：William Shawcross, *The Quality of Mercy: Cambodia, Holocaust and Modern Conscience* (New York, 1984)；Samantha Power, “A Problem From Hell”: *American and the Age of Genocide* (New York: Harper Perennial, 2003)；Fred A. Lazin, *The Struggle for Soviet Jewry in American Politics: Israel Versus the American Jewish Establishment* (New York: Lexington Books, 2005)；Allen D. Hertzke, *Freeing Gods Children: The Unlikely Alliance for Global Human Rights* (Maryland: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2004) .

批判立场则来自芬克尔斯坦 (Norman Finkelstein)。在《大屠杀产业》^①一书中,他评述了美国犹太社团如何将大屠杀记忆意识形态化,并利用大屠杀来获取政治和经济利益。在《勇猛之余》^②一书中,他又对以色列和美国犹太人误用和滥用反犹太主义和历史悲情进行了抨击。另外,在埃兰·罗森鲍姆 (Alan S. Rosenbaum) 主编的《大屠杀是否独特?》^③一书中,各位作者围绕大屠杀是否独特这一问题展开讨论。有的学者认为大屠杀并不独特,可以与人类历史上其它的种族灭绝或人道主义大灾难进行比较,犹太人并非历史上最悲惨的群体;也有学者主张大屠杀是独特的,犹太民族的苦难非其余历史悲剧可比。

第四,以美国大众文化中的某一类甚至某一个具体的大屠杀记忆项目为研究对象,分析其社会政治背景和影响。细分之,则可以分为纪念馆、文学、影视、历史教育等类别。关于美国的大屠杀纪念馆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华盛顿的“美国大屠杀纪念馆 (USHMM)”、洛杉矶的西蒙·维森塔尔中心的宽容博物馆、以及纽约的“犹太遗产博物馆”等重要场馆的研究。^④ 桑德勒 (Jeffrey

① Norman G. Finkelstein, *The Holocaust Industry: Reflection on the Exploitation of Jewish Suffering* (New York, 2000) .

② Norman G. Finkelstein, *Beyond Chutzpah: on the Misuse of Anti-Semitism and the Abuse of History*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8) .

③ Alan S. Rosenbaum, *Is the Holocaust Unique?* (Boulder: Westview Press, 2009) .

④ 吉米斯·杨对西方许多国家大屠杀纪念场馆、纪念日活动进行了研究,阐释了不同场馆的不同艺术风格及其表达的社会政治话语 (参见 James E. Young, *The Texture of Memory: Holocaust Memorials and Meaning*,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3)。塞德尔则细致地剖析了纽约大屠杀纪念馆酝酿、推进、建成过程中的社会政治背景及其与美国其他主要纪念馆的差异。(参见 Rochelle G. Saidel, *Never Too Late To Remember: The Politics Behind New York City's Holocaust Museum*, New York: Holmes & Meier Publishers, 1996); 另外,温伯格和艾丽丽以及利林塔尔等,都对华盛顿的美国大屠杀纪念馆酝酿和建成过程中的种种错综复杂的斗争进行了深入阐述 (参见, Jeshajahu Weinerg & Rina Elieli, *The Holocaust Museum in Washington*, New York, 1995; Edward T. Linenthal, *Preserving Memory: the Struggle to Create America's Holocaust Museum*, New York, 1995); .

Shandler) 在《观看大屠杀》^①一书中,对不同时期美国的大屠杀影视节目进行了研究,剖析其对美国社会政治话语的影响。埃兰·米恩茨(Alan Mintz)在《大众文化和建构美国的大屠杀记忆》^②中选择以大屠杀电影为主要视角。耶尔·欧隆(Yair Auron)在《知识之痛》^③一书中,简要分析和比较了以色列、美国等国家的主要大屠杀教育项目。

这些著述主要以美国犹太社团的地位和利益为视角,来分析大屠杀记忆在美国逐渐扩展的进程及其影响。犹太人显然在大屠杀记忆的表述中占据着主导地位,而这一话语政治中的另一方,即基督教,则处于相对弱势状态。就整体而言,美国基督教对大屠杀历史悲剧的认知是一个与犹太社团不断对话中逐渐加深的进程。关于基督教和美国在大屠杀中的历史角色和责任,以及大屠杀后双方关系重构等一系列问题,双方所形成的共识或分歧正是改变美国(乃至基督教世界)社会内部道义资本和社会权力分配的重要动因。它对于犹太社团在美国地位和力量的提升,对于美国奉行一项带有浓厚道义色彩的对以政策都有着重要影响。但由于探讨犹太人权力或影响力在美国是一个涉及“政治正确”的敏感话题,将大屠杀记忆或者反犹主义话题与美国犹太人权力关联起来很可能受到“反犹主义”或者“自我憎恨”的指控,因此,将关于大屠杀记忆的话语表达置于社会政治权力体系来加以考察,仍然是一个可以进一步研究的问题。另外,这一悲剧记忆唯有实现“美国化”,才能成为美国主流社会藉以界定“美国认同”的重要因素。美国信条与纳粹噩梦之间的

① Jeffrey Shandler, *While America Watches: Televising the Holocaus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

② Alan Mintz, *Popular Culture and the Shaping of Holocaust Memory in America* (Seattle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1) .

③ Yair Auron, *Holocaust and Genocide Issue in Education: the Pain of Knowledge* (New Brunswick & London: Transaction Publishers, 2005) .